

客家新探

谭元亨摇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摇客家新探 转 元亨著 援—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圆园园~~圆园园
摇(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5) 第 1181 号

版权所有 搖盜版必究

总 序

刘日知摇李元元

摇摇 客家文化，与广府、潮汕文化一道，共同托举了整个广东文化的大鼎，在建设广东文化大省中，地位举足轻重。作为客都，作为广东客家文化的中心地，“文化梅州”的彰显，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客家文化的兴起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题中之义。众所周知，世界客属大会已召开了 四届，不仅在中国多个省份（包括台湾）多次召开，而且在东南亚，乃至大洋彼岸的美洲，也都召开过。它已经成为了具有世界性的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其影响正日益扩大，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

客家文化固然是广东文化或岭南文化中的一部分，但二者却不存在从属或画等号的关系。因为，客家文化本身是一种非地域文化的表述，它的一部分可以与岭南文化相互叠合，但覆盖国内 五多个省并远播到海外近百个国家的这一分布，使之更具民族文化特质，是中华文化当中独特的无以替代的重要成分。这一事实表明，上百年客家学的兴起，一波接一波，不仅在广东、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都是与这一文化特质分不开的。客家文化之所以引起世界上那么多著名学者的关注，并不断有新成果出现，正在于这一非地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为此，被海内外所认同的客都梅州，理应有自己更成熟、更浑厚也更新的声音——拿出反映客家文化的力作来。

摇刘日知系中共梅州市委书记，李元元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

摇 员

摇摇由梅州市委宣传部牵头，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深圳市文联客家研究室、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编纂的《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就是这样诞生的。

梅州，是客家民系成熟、定型的中心地，更是客家民系向五湖四海，尤其是向全世界扩展的集散地。因此，全球客家人认同梅州为客都，与认同赣南为客家摇篮、闽西为客家祖地是相一致的。粤闽赣“客家大本营”占有客家人口一半左右，其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随着“泛珠三角”战略的提出，这个大本营正好列入这一大战略地图之中，其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正在到来。而我们这套书系，也算是为这一黄金时期的到来鸣锣开道，并期许其更辉煌的未来。

参与编纂这一书系的作者，均是来自广州、深圳、梅州的知名客家学研究专家，他们不拘陈说，敢于立言，为这套书添彩不少。客家学需要不断开拓自己新的领域，方可以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立于科学的不败之地。

我们不难体察到专家们的良苦用心，这一书系的八部书，正是从八个不同的领域上向前拓展，从而相对地形成自己的系列。相信广大的客家人也与我们一样，视之为客家人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从中汲取到更多的养分。

近年来，无论是客家文化的系列丛书，还是广东历史文化的书系，都出版了很多种。可以说，不同的系列，有不同的特色，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书系，学术品位高，严谨、细致、自有独到之处；有的书系，面向广大读者，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普及功能见长；有的书系，别开生面，独辟蹊径，剥茧抽丝，环环相扣，又是一番风光……总之，各有千秋。

这套“客家与梅州书系”，研读下来，有如下鲜明的特色：

一是其首部“新探”，先声夺人。明确其意向在开拓与深化，它坚持的是客家研究的主流派的观点，但对传统的

“南下说”予以了补充与必要的修正，尤其是从人类学、历史学及哲学的高度上，突破了谱牒考证的樊篱，从文化动因、民族自尊、心理认同诸多方面，强化了“南下说”的论证，使之置于整个中华民族移民史乃至整个世界民族大迁徙的背景上。读罢，不仅倍获教益，且很受鼓舞。客家学研究，就需要这样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新领域，切不可固步自封，亦不可数典忘祖、哗众取宠。

二是书系所显示出的整体性与科学性。八部书，当是八个不同的维度，立体地烘托出整个客家学的构架，不至于顾此失彼，造成某种偏颇。无论是历史还是现状，是高雅文化还是民俗文化，人文地理、精神气候，都得以出色地表现。这不仅要有宏观的视野，也要有细部的描绘，殊为不易。

三是雅俗共赏，有广泛的受众。这里，有不少篇章，都文采斐然，有诗情画意，亦富于哲理的思考。其实，雅俗共赏，从不影响任何一部书的艺术性，这是大家的共识了；同样，它也不会影响作品的思想深度。思想一旦掌握了大众，就会化作一道疾闪，照亮世界历史，也包括客家历史的进程。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示出的是客家人广博的精神世界。

正是上述几大特色，使这套书系既有高品位、高格调，又通俗易懂，老百姓喜闻乐见。一卷在手，自会兴趣盎然。因此，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开放为先锋的时代精神上，这套书系自有其不俗的表现。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同志，多年来一直很关心客家文化，很关心梅州的发展，这次欣然命笔，为八部书题写了书名，这令我们深为感动。

愿“文化梅州”更光彩四射！

愿客家人更奋发向前！

引子：客家神话的还原

千年迁徙，万里长旋，是怎样的历史与空间的跨度？

经磨历劫，九死一生，莫非风雨桥也在诉诸这征途上的颠沛流离？

家园梦断，异乡回望，是怎样教人断肠？

而筚路蓝缕，拓荒垦殖，又该有多少可歌可泣、壮怀激烈的记忆？

……

有人说，客家如同一个神话。

说这话的人，本意是要否定这么一个民系，否定这么一种文化的存在，认为是自恋情结生发出来的“神话”，纯然是历史的误会。

殊不知，他原想用“神话”这一词侮蔑客家人，结果反而是一种抬举、一种称颂！可不，一部历经千磨万击而写就的客家文化历史，无疑是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的一部“神话”故事，让后人永远地传扬！

的确，在中古时期，为何在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东方，会逐渐地产生这样一个奇特的、独立的民系？他们经过千年的漂泊、万般的磨难，竟然在东方大地上奇迹般地崛起——从浑沌中走出，终于走向光焰万丈的太阳。这不是“神话”又是什么？

关于客家的产生，关于客家的文化，关于客家的一切，对于中国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迄今仍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神秘、奇妙的千年之谜。

不过，对于客家来说，其总体的文化意识却是可以理出一条线索来的，有其产生和发展逻辑。连缀、贯通其客观联系的规律，揭示出其深刻的内涵，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历史工程。在我们之前，已经不少人做过；在我们之后，也还会有人去做。思想，被视作历史最终的真实；文化精神，自然也是独特卓行的客家民系的真实。我们试图从

寻索这一文化精神入手，去重现、解读客家民系的历史真实。就是说，把“神话”还原为历史的本原。

这便是本书的根本宗旨。

其实，这一还原，仍是下面三大问题：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往何处去？

这恐怕是人类永恒的询问，不单单客家人如此！

古老历史的真实，往往是隐蔽在神话与传说后边的，问题是如何去逼近它，尽可能地揭示它，破译它，给予一个科学的、合理的解释。

本书作为“新探”，就让我们作新的叩问，新的追寻，新的破译吧！

上篇搖千年迁徙

一、从“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说起

最早进入我们以及读者视野的，当然是客家人的千年宿命——那永恒的漂泊，一次又一次的大迁徙！

从北方到南方；

从中土到边陲；

从故国到异域……

在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这种漂泊的距离、迁徙的规模，恐怕很难有别的民族可以作出比较，包括犹太人，且不说其无近亿之众，就是说其踪迹所及之处，也不如客家人。至少，在远东、在东南亚，就很少有过他们的踪影。

九州初肇，中土发祥——这无疑是客家人的根系所在，是大迁徙最早的起点。

“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这一谚语，隐含了当年大跨度的跳跃，甚至包含着南北文化的巨大超越。历史的苍凉，时代的变迁，也都可以从中体悟出来。

却分明也有一种豪迈的气概在内——那便是对祖先的崇敬，对创业的骄傲，以及对未来的期许。

这是一种大迁徙的语言。

没有大迁徙，便没有这种语言。

有山的语言，有海的语言，也有山海与共的语言——这种大迁徙的话语，正是山与海同在的语境中发生的。

其间，你听得到山风呼啸；

其间，你感觉得到海涛澎湃……

在讨论哪一次大迁徙可以列入客家先民最早的且作为群体的大迁徙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这么一个问题，这就是，何以为民系、族

群乃至民族？形成一个民系或族群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而这些先决条件又是怎么产生并且影响至深的？

换一句时兴的话来说，一个民系或族群的凝聚力是什么？而这一凝聚力又是怎么产生的？它决定了一个民系或族群怎样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是血缘的、宗法的关系，是共同拥有的历史？是地理的、物质的因素，是综合的社会关系？是统一的理念、追求、习俗与共性，也就是共同的意愿以及一致认可并自觉服从的价值观——主要是精神的因素？……

这样的追问还可以有很多——学术上严谨的态度，当是一问到底，以释所有的疑惑。

而对于客家民系而言，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有很多。一般而言，人们都相当认同血缘关系（如客家人中流传的小脚趾重甲的共同特征）、语言（客方言，有的专家还严格论证了须以客方言来界定这个民系），以及所在区域（以闽粤赣三省毗连地为客家大本营）决定了客家这个民系。这固然不错，但这三大因素显然有重大的缺陷，无以区别以地域、方言命名的其他民系——如广东的广府人、潮汕人（福佬人）。至于重甲，只是作为汉人这么一个大系统的标识（客家人以此强调自己是古汉民族的成员）。

而这一切，都是指向过去。

我们强调民系或民族的凝聚力，总是指向其过去，过去优秀的历史传统，已有的辉煌业绩，这一切所带来的光荣与自豪，也就是对丰富多彩的记忆遗产的共同占有——自然，也包括有屈辱，如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的羞耻。

但是，光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就足以凝聚住一个民族与民系乃至国家么？

拿破仑是科西嘉人，他出生前，科西嘉并非法国的领土，也就是说，他并无法国人的祖先，无法国人的历史荣耀可言，法国人可以把这位科西嘉人“另列”，但他却成为法国的骄傲。对于前苏联来说，格鲁吉亚的斯大林、乌克兰的赫鲁晓夫都出自少数民族，今天，对于俄罗斯而言，他们便成了外国人。而戈尔巴乔夫呢？为什么前苏联会在他手中分崩离析，是因为当时的苏联人不曾拥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记忆”么？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有很多！

问题恰恰出在：戈尔巴乔夫未能给当时的苏联人一个可信的、值

得去奋斗的共同的未来！

他所缺的凝聚力，恰恰不是过去，而是未来，与今天相衔接的未来。

也就是说，更具凝聚力的，恰恰在当下，对未来的自信。而对未来的自信则是在现实中扎根的，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则在于共同生活、共同奋斗的意愿，对保持统一意志的持续诉求，一个现实但又可行的、伟大的目标，这才是最大的凝聚力，为此，人们才可能为之牺牲，克勤克俭，乃至献出生命。

任何一个民族、民系，并不是与史俱来的，有的很早就形成了，有的却相对较迟，不能说他们形成前便有丰富的历史而产生了凝聚力；相反，正是一个可信的未来才让一个民族走在一起。当人们说为民族而战时，如果说这个民族仅有过去与现在，又怎么能号召其成员去保卫它，让它不至于被伤害乃至被消灭呢？要保卫的，恰巧正是它的未来。

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否认过去，否定历史。过去或历史，传统与回忆，毋庸置疑，是这一凝聚力的组成部分乃至强化因素——正如我们不忘近代史上半殖民地的耻辱，为的是今日的自强以及明天的富强繁荣。

正因为客家人是汉族中稍后形成的民系，所以，我们需强调的正是历次大迁徙的根本的文化动因，为什么有的人留下了，而他们却非走不可……也就是说，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去重新探讨客家民系之所以形成所凭借的凝聚力，而不是一味地把大迁徙的历史往前推，直至推到夏、商、周那么遥远的时代（有人称，“客家”即“夏”家，也有人说，客家是被北方来的周人压迫到南方的殷商后裔，更有人说，客家传承的是周代的传统……）。

我们所探讨的，正是客家人每次迁徙中的“未来的指向”，以及客家人身上“文化记忆的历史定格”，从而去确认哪次是最早的，并带有那一次“文化记忆”，尤其是所形成的价值观——文化，本就是价值观的表现，成为他们大迁徙中的动力。

以上，只是一个粗略的、提示性的开篇，尚需严谨的学术上的论证。

当我们说一个民系的凝聚力在于未来的指向时，实际上是在追寻这一未来指向是怎么来的，它怎么会成为整个群体一致的指向，并且能在历史的演变中坚持了下来。

这一未来指向，当然是群体的意愿。而意愿的产生，则有历史的动因以及现实的情状所需——这么归结下来的话，意味着唯有巨大的历史变动，特别是大的灾难，方可促使这一群体共同意愿的产生，这历史动因自然是这个群体过去视为荣耀的、珍贵的记忆，而现实情状则是所面临的巨大的灾难——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

面对灾难所作的选择，自然是共同的意愿决定下来的。大迁徙绝不是盲目的，它首要的选择当然是趋利避害，第一是生存，而后才是对历史记忆的维系，保存既往的传统。精神因素上，归根结底是业已形成的价值观。换句话说，意愿或者未来指向是在一定的价值观下形成的；反过来，意愿或者未来指向是为了这一价值观的实现。二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意愿便是价值的选择。

当晋代大量侨置郡县于江南一带时，无疑正是把原来在中原的社会构想或民族构想移植到南方来，这是一种意愿的表现。这种意愿，则与中原土族的生存价值准则之间有着完全的一致，这才有召唤力，才有凝聚力。应该说，这种“侨置”或“客居”，视他乡为故乡的理念，是当时形成的，并且在后来的历史中一脉贯穿下来了——毕竟，直至近代，大都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是武力南下，把中原人压迫、压缩到了南方。而周王朝“安土重迁”的理念，只能保存在留在原地的人们，对早已抛离故土者不再起作用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侨置”或“客居”措施对人的理念产生的重要作用，由客居，到客户，到客人，及至反客为主，成了客家，无论某些食古不化者如何不承认这几个“客”之间有必然联系，但从思想史的角度，从观念演化的角度来看，这却又是在所必然的——最可靠的，反而是思想理念的历史，因为那已经不可伪造、篡改了。

重大的历史灾难，则是让举行大迁徙的群体产生共同的意愿的主要因素。很难说，某些单个的局部的战争或者天灾，会让整个群体产生共同意愿，从而形成一个有共同理念与特征的民族、民系或族群——这毕竟是大规模的集成。所以，历史上大的族系的形成，总是有巨大的历史背景，只是我们的文明史太悠久了，我们对一个民族的文明赖以产生的基本原因总是有某些模糊，但是，这个民族所显示出的总体风貌却在历史沧桑中凸现出来，并通过与其他族系的比较，其所呈现的差异，让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或领悟出其精神追求及价值准则。这里不妨以犹太人为例，他们是世界的商人，但又同时是学者、教士与文化人。同样，客家人与同在广东的广府人、潮汕人相比，他

们重义轻利的传统特征更突出，敢作敢为的开拓精神也让人感佩。而这，与客家人曾面临的众多历史灾难不无关系。毕竟，同样在历史大变动中，广府人早在汉代已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则余下广州是平安的，有出土文物为证：“永嘉世，天下乱，余广州，安且康。”而作为“八姓入闽”而形成的福佬（含潮汕）民系，也上千年相当稳定地居住在福建，比客家人要安居得多。也正因为这样，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在南方，客家人的历史表现也就突出得多，甚至卓越得多。他们在逆境中的表现，每每比在安定的环境中要出色得多。

民系的差异就是这么出来的。

民系价值准则的对比就是这么显现的。

这也是历史的结晶，但更说明其未来的指向——如果我们把“现在”置于晋代、唐末，尤其是两宋之际。

“共同的历史记忆”或“文化记忆的历史定格”——强调的正是过去所凝固下来的价值观、人生观。

那么，“未来的指向”或“未来的利益所系”可是一种理想主义？

客家人，被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民系，又如何与历史的记忆相协调、相融洽呢？

一方是风雨雷电、冰霜冻雪；

一方是丽日蓝天、春风化雨。

是昔日的苦难，加重了理想的成分——那是人类的一种渴求，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尴尬状态？

也许，当可以解释为一种民系性格：宽容、厚道，而非以恶抗恶，走向精神暴力……

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在于历史与人类的意愿或构想的一致。当然，历史的逻辑并不完全等于人类某些设计者内心的逻辑。不过，历史与意愿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人类，尤其是族系的意愿总是服从于历史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历史的进程。

可以说，意愿或者构想，是历史必然的产物，族群或民系只能选择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文明及社会环境所提供的可能的构想。反过来，历史亦是意愿或构想的产物而不是别的什么，二者同样是相互作用的。当我们说现实的意愿或构想源于过去的历史，那么，未来的历史则源于今天的现实构想与意愿。客家这个民系之所以今天是这样，当与过去的构想分不开——似乎历史早已作出了“规定”：既不

同于广府人，也不同于福佬。当我们回首一部客家史时，尤其是如文天祥、袁崇焕、洪秀全、黄遵宪的历史业绩时，那种万难不屈、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正气，不正回荡在今天这一个族群之中么？而这种业绩、正气，在这个族群中理所当然地具有一种永恒的示范作用及价值标准。

当我们称客家是个“形而上”的民系，也就表明我们更重视这个民系精神上的因素，也就是这个民系共同的意愿或构想所催生的一部英雄史——他不似犹太人是商人的民族，而是英雄与平民互为补充的一个民系，其之理念便建立在我们共知的客家人有别于其他民系的特点之上。

很显然，客家人与犹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虽然同为大迁徙的族群，由于其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所以，即便有相同的命运也不会有相同的意愿。我们不可能为所谓“适应”商品大潮或市场经济，也要客家人变成一个商人的族群，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办不到的。东方有东方的传统，纵使在现代化上早走一步的日本、韩国，也有与西方迥异的价值观。例如，在韩国，人们就把“见利思义”四个字刻成石碑作为他们的座右铭，在“利”的冲击下，仍恪守“义”的古训，这是颇值得我们深思的。无端地指责客家人商品意识、市场意识欠缺，未必就是公允的。客家人只能是客家人，已有的评价不仅确认了过去，也同样在塑造未来。

关于文明，有一个定义，不管准确与否，完整与否，倒是值得思考的。那就是说，文明是一种价值观或思维方式。客家作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自然在总体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上是相当一致的。当然，它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也是人所公认的，二者亦有互动的作用。那么，作为客家人的价值观，当是历史的延续，可以在一片不毛之地，开拓出田园、港口、城镇来——“客人开埠”一说正是这么来的。如果是墨守成规，安于宿命，把价值观定位在这上面，也就没有了客家人的业绩，甚至没有了客家人。

思维方式的改变，当可从广东改革开放中看到，在这之前，广东是我国比较落后的省份之一。由此不难想象，明、清二朝禁海造成沿海的经济重创、民生凋敝；可一旦开禁、开放，这里便风生水起，“无”中生有，平地致富了，智慧与财富一同见风日长。人还是一样的人，一旦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便会创造出人间奇迹来——自然，这与广东人（包括客家人，其占广东人口的 $\frac{1}{5}$ 左右）的历史底气

是分不开的，而这历史底气——如 1000 年前的海上丝路、近代的三大革命运动，则成为了现实构想，并推动了历史的加速前行。

这种可见的功利价值——不独是财富，包括传统的光宗耀祖、流芳百世，或者功名之类，其促成的努力与发愤，无疑是有相当大的凝聚力的，令整个族群亦步亦趋。但即便是在同一情状下，客家人与相邻的广府人、潮汕人还是有差异的，包括价值观在内。他们的评价方式绝不仅仅立足于“利”，而会，或者说仍要意识到“义”的存在，“不义之财”是不可取的。所以，人家可以不择手段，他们却做不出来，乍一看，他们又保守得多，不敢冒险，但这分明与其价值观、思维方式或历史意愿分不开，并不能证明他们缺乏开拓精神。我们可以称潮汕人是一个商业或商人的民系，其整体价值系统是贯穿商人利益的——这也可以从温州人（虽然他们不是潮汕人）的口头禅上看起来：“打来兮（也行），骂来兮（也行），赔本的生意勿来兮。”但我们却不这么去评价客家人，他们倒是与“打也行，骂也行，扔下书不读万万不行”，大致可以相称。

这几条说下来，似乎又有了若干“神化”的色彩，但是，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面对这种分析与评价，又不能不觉得，这恰好是最历史的，最现实的。

最历史的也是最现实的。

这正是把神话还原为历史、还愿为现实的最好途径。

所谓“途径”，无非就是方法，或者说解决疑问的思路。

这也许不比万里迁徙容易。

毕竟，一百年了，多少代学者都跋涉在这一艰途上，力图走通它。

无论前边是壁立千仞，还是瀚海无垠。

都得走下去！

二、文化记忆的历史定格

客家人对文化的恪守，对书本的虔诚，珍惜字纸，敬畏文章，在南方若干族群看来，似乎也算是“走火入魔”了。

可不如此，客家人又怎么去确认自身的价值、自身的前景呢？

这是神化么？又不见得。书刚刚打开，似乎没必要那么急急忙忙地得出结论。

前面一节，我们不仅从历史变迁上，而且是从学理的角度上，试图去寻找、去解答一个民系或一个族群的凝聚力是什么，以及它对形成这个族系又起到何等作用等这样的问题。

无疑，共同的意愿，也可以说是共同的未来构想，是形成并令整个群体认可且服从的价值观，以及这一价值观与其他群体呈现出的差异；也就是说，这种精神上的因素才是最大的、最根本的凝聚力所在，它当超越血缘的、宗法的，以及地理的、物质上的诸多因素之上，成为决定性的一环。

而这种未来的构想，当是与历史相一致的。所以，今天对客家人的评价，事实上也反映了这个民系的未来风貌。

当然，上述所说的，无论是意愿、构想，都是“形而上”的，是精神上的因素，但其之延伸发展则会落到实处，诸如功利、行为上面，这也就让评价内容趋于具体——具体的族系的风貌、品格及价值取向，尤其是与其他参照系统呈现的差异，各自不同的人生准则、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

不过，只是这几点的归结，还是远不够的，我们还可以延伸出更新的、更实际的参照标准来，并以此重新界定一个族系的发生与形成的条件、原因。

一般来说，形成民族、民系，均需要几大因素——这都是老一辈治学者提出来并加以详细论证过的。这几大因素是：

（一）共同的生活地域；

(二) 共同的经济成分；

(三) 共同的语言；

(四) 共同的心理素质。

这是民族形成的因素，用在民系、族群上，大致也相符，但未必周全。尤其是对于一个在流徙中的民系而言，某些条件就不一定成立，而且也“硬性”了点。

从上述的理论总结，我们可另外引申出若干因素来——其中，有与之相吻合或重叠的，但也有不尽一致的，当更严谨一些。

第一，当有一个宏观的视野，对民系形成的历史大背景须有“整体观”。

这也正是前边所揭示的。一般来说，在历史大变动之中，才可能酝酿、催生一个民族或民系，也就是说，促使相当大规模的群体产生共同的意愿、共同的理念——如客家人一次又一次的大迁徙。而任何历史的大变动，都有着深刻的背景，自然地理上的大冰川期、小冰川期，由此而带来的自然灾害；或者人类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战争、动乱……这些，在人类文化的历史演变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产生深刻的影响。只有弄清这样的大背景，有个整体观，方可以真正把握住民系发生的根本动因。这是对民系形成前史的整体把握，对其“过去时”的宏观了解。

因此，局部的、个别的、小的“变局”，是否足以构成一个民系形成的前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自然也就是否定的，因为这不足以促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群体产生共同的意愿、理念，作出选择。纵观历史，任何民族或民系的“创世纪”神话，都与当时巨大的历史变动乃至惨祸分不开，不可能在波澜不惊的岁月，或者寻常的社会生活中发生或裂变出新的成分来。其实，这与自然科学中的原理也是相通的。人类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实体，也就难免带有这一“物质”的属性。

所以，客家形成的前史，当在这样的历史大变动中寻找，而不应无限推前或拘泥于某些小的变化。

第二，当从今天的民系或族群的心理积淀、整体风貌上回溯并确定其形成时期——换句话说，今天的一切正是那个时期的“未来的指向”。

《客家圣典》中，实质上已经确定了这么一个依据或原则：